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碰撞与融会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

▶ 周发祥 魏崇新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碰撞与融会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

► 周发祥 魏崇新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碰撞与融会: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 / 周发祥, 魏崇新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4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600-4994-X

I. 碰… II. ①周… ②魏… III. 比较文学—文集 IV. 1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5864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周晓云

封面设计: 彭 山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4994-X

定 价: 27.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前 言

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一文中曾对单一学科的教育提出过批评。蔡先生说：“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它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蔡先生提倡的是通才教育。蔡先生的这个提法对中国的外语类院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人文教育的相对薄弱，中国文化的素养相对不足，使得外语类院校的毕业生的文化和学术视野相对狭窄，并已经严重阻碍外语类院校的学科发展，其严重性已经引起了很多专家和学者的重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今天的外语教学已经与当年吴宓先生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所倡导的“会通中西，学识博雅”的外语教育思路相距越来越远了。

那么，如何在外语类院校加强人文学科的教育呢？把比较文学课程列入外语类院校的基础课程应该是办法之一。杨周翰先生当年曾经说过：“我们出版的外国文学史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很不够，有时又很勉强，最不够的是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今文学的联系……我觉得教外国文学有意识地同中国文学作些比较，辨其异同，可以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本国文学的理解。”杨先生的话点出了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缺憾。外国文学是外语类院校的主干课程。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往往忽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只是单纯地分析和讲解外国的文学作品，很少自觉地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加以比较，无论是历史地比较还是平行地比较。其实细想起来，如果完全抛开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的讲授和研究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毕竟是在

中国的大学里讲授外国文学，我们面对的是在中国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够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出发来讲授和研究外国文学，我们的学生就不会跟在国外研究人员的后面，人云亦云，而会逐渐学会用一种比较独特的视角来欣赏和分析外国的文学作品。

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一所有着优良学术传统的大学。当年吴宓先生的两位高足王佐良和周珏良教授不仅是北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创立时期的奠基人。王佐良先生是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的前三届的中方代表团团长，他的《论契合》一书曾获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最高荣誉奖。他们为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学术遗产。另外，北外讲授着34种外国语言，这也为我们展开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创造了语言上和学术上的条件。去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标志着我们将继承这份珍贵的学术遗产，发挥北外的优势，把比较文学作为我们的重要学科来建设。

为发扬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我们于2004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部分外语类院校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讨论会，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在外语类院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同时也应发挥外语类院校的学术力量，推动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这套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第一辑收录了五本，分别为《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构造普遍诗学——周珏良比较文学论集》、《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上、下）、《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希望该丛书的推出能够对我国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有所助益，有所启示，也衷心希望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新世纪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开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

编者序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文集选自上个世纪的学术论文,它们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对象的比较研究,或者说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种编选角度便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两门学科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



从历史上看,比较文学与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结缘由来已久。印度佛教的东渐,始开中外文化与文学大规模交流的先河,随之佛教因素渗入了文学创作,禅、佛视角也见于文学批评。明清之际基督教继之东渐,中西比照,神、儒并观又见于学界。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均带有比较文学研究的性质。不过,到了20世纪,比较文学在我国才形成较大规模,而且其蓬勃发展多半是建筑在与古典文学的结缘之上。

在这一百年间,比较文学留下了一条曲折而坎坷的发展轨迹,但它最终走上了前景无限光明的通途。

清末民初,文学成为挽国运、开民智的有力工具,西方思潮乘时汹涌而来,我国的传统学术面临严峻挑战,亟待解决何以为继的问题,其中古典文学研究也不例外。所谓“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途日多”(严复《译〈天演论〉自序》),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有人甚至预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些敏于求新的学者孜孜然探索西学的原理与观念,捕捉西学的视角与方法,以便借用这些新事物来剖析古典文学。学界初次尝试是多方面的,也不独以西学为是。林纾借译本序跋比较中西小说,鲁迅倡导革命诗派并使中西诗歌成鲜明对照,王国维利用西方悲剧理论和美学

理论透视中国的小说和诗歌,林传甲、黄人仿照日人和西人创立文学通史体例等等,均是开创性的研究实例。这些做法或者本身即是比较文学的操作,或者与比较文学密切相关。它在独立门户之初便独辟蹊径,勇于探索,给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五四运动至建国之前,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了大学课堂,而傅东华、戴望舒分别翻译的《比较文学史》(洛里哀著)、《比较文学论》(梵第根著)又强化了它的学科性。这时倡导平行比较的美国学派尚未出现,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实践却已几乎涵盖了比较文学的所有范畴,即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翻译研究、比较诗学和西论中用。它的拓展给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多方面的影响。从学术格局来看,传统研究在西学的影响下逐渐摆脱了主观随意的印象式批评,而代之以客观性、思辨性的考察,从而发生了质的改变。郑振铎在分析“鉴赏”与“研究”的区别并进而指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正是基于西学规范,倡导“进化的观念”(达尔文)和“归纳的考察”(培根)。①他所编的论集《中国文学研究》正好体现了这一点,具有科学性质的新学术与传统的注疏、评点、赏析相比已有明显的不同。这时有几部重要的著作和文集特别引人注目。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钱钟书的《谈艺录》多作平行比较;“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谈艺录·序》)是他们的共识,因此这两位前贤在探索诗旨、诗情、诗艺、诗论时,便顺手拈来中西作品以相互映衬,相互发明;有时则着眼于更深层次,发掘幽隐奥妙的蕴涵,如探索“笔补造化”、诗句的生命力等等。②

① 参阅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见《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郑振铎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② 钱钟书认为,李贺“笔补造化天无功”句不仅是“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且涉及“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并进而列举西方学者说明“笔补造化”有“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和“润饰自然,功夺造化”两大宗(《谈艺录》第十五则)。在《诗与真·论诗》一文中,梁宗岱同时援引陶渊明、李白、李后主、歌德、雪莱、魏尔仑的诗句,探索其中富有生命力的诗魂。

朱光潜的《诗论》是一种论旨单一的比较，全文专论中国诗歌（主要是古诗），依次说起源、谐隐、境界、节奏、声韵和格律等问题，但每每选取西方诗歌和诗论以强化自己的论点，显示出研究方法的灵活性。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则属于影响研究，着重阐述中国古典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和传播。论者对这一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他在“绪论”中指出：大凡外来文学发生影响，通常要经历翻译、仿效和创造三个阶段；德译中是为后人开新路，仿效则要进一步表达原文精华，而创造性著作已“不是用德国的精神来熔铸中国的材料，乃是用中国的精神来熔铸德国的材料”。论者即本着上述宗旨，在胪列史实、剖析文义的同时，阐明中、德文学产生亲和力的契机。朱谦之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先后撰写《音乐文学小史》、《中国音乐文学史》两书，后一部的论述趋于详赡；^①论者认为，要懂得文学与音乐的关系，须懂得两者与情感共通的关系，因此他围绕一个“情”字，缕述诗乐、楚声、乐府、唐诗、宋词和元曲中两者的烘托与融合。这个时期还散在一定数量的论文，它们也以上述的研究类型为主，但涉及面更宽泛些，诸如关于中西诗文、戏剧、童话、民间故事以及母题、诗趣、诗体的比照，关于中印、中日、中俄、中西文学交流史的考察，关于诗与画、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间相互关系的辨析，已经屡见不鲜。此外，尚有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以及就我国现代文学所做的比较研究）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建国之后我国的比较文学进入了一个非正常的发展时期。五四前后始见东渐端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时被奉为圭臬，比较文学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文艺学的一种“伪科学”方法而遭到排斥。但就实际情况而言，这时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销声匿迹，只不过是处于潜在的状态而已，或者说学界虽不言比较文学而比较文学在焉。其表现在如下

^① 顺便指出，陈钟凡作长序弁于卷首，并分古乐、变乐和今乐三个时期详叙之。

数端：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属于西方理论，它在我国持续地译介与消化，并基于我国深厚的古典传统，终于孕育出适合我国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新理论，其间暗含着中西文论的比较。第二，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做法，实际就是比较文学范畴里的西论中用，而且实践证明，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对于正确认识古典文学创作和发展的规律性问题是不可或缺的。第三，这时也有若干古典文学研究个案——如：考察《赵氏孤儿》在英国的流传、兼用西论以剖析《红楼梦》、李渔的戏剧结构论及《文心雕龙》创作论、^①追溯中印、中朝古代文化与文学交流等等——则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范畴。由此来看，尽管建国后的十七年多见“左”倾思潮硬性的批判与否定、庸俗社会学肤浅的标签主义，但这时比较研究的某些成果还是不容忽视的。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结束了错误路线的干扰，我国比较文学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个时期比较文学着力强化自身的学科建设，编教材、办刊物、召开研讨会、在大学开设专业课程，比较文学顺时应变，不久便成了一门显学。与此同时，比较文学研究者也积极参与外国文论的引进工作，众多欧美国家（及其他国家）的文艺理论得到了译介，学术视野大为扩展。于是，比较文学的实践活动也随之空前活跃起来。我国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均被当作研究对象，而古典文学比较研究的个案仍不在少数。^②由于比较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其研究类型遂繁衍增殖，诸如渊源学、译介学、流传学、形象学、主题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分支研究渐渐固定下来，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崭露头角。这时中外文学关系的考察和梳理成绩斐然，我国与邻国、与欧美的文学交往几乎均有专书述及。这些著作上下条贯，脉络明晰，堪

① 此处指王元化所撰《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于1979年出版，但作者于1961年动笔，1966年初完成初稿（详见该书“后记”）。

② 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内约有一万篇论文发表。参见王向远等编：《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也包括少量不涉及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称中国学派比较研究的范例。平行比较易惹牵强附会之讥,相对而言,这时的中外文类、诗艺、母题的对照能贴近文本,非议较少。钱钟书的《管锥编》亦多平行比较,同时涉及作品和理论;论者博览群书,探赜抉隐,处处充盈着贯通中外、融会古今的意趣;这部鸿篇巨制尽管采取札记体例,与当今的学术格局有所不同,但给人启发是十分深刻的。新发展也带来了新思考,这时西论的冲击、取材的泛化、探索的深入又使比较文学面临严峻的考验,但无论如何,它接受挑战、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必然是深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过程。

回顾20世纪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不应忘记国外汉学家和港台学者的贡献。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先后不一,方法有别,迄今大致已经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板块:日韩学术、俄苏学术和欧美学术。日韩学术接近我国的传统学术,比较研究关注交流与影响、接受与创新,关于中日、中韩间文学姻缘的考察较为细致。俄苏学术接近西方且有独创,环顾东西方的类型学研究颇具特色。欧美(尤其是美国)学术阵容庞大,硕果累累,他们置身于西方学术的环境之中,亲历20世纪文艺思潮的更迭代谢,得风气之先,倾向于移植新理论、采取新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因此在方法论方面的开拓发人深思;此外,他们还占有颇多关于中国文学西播的原始资料,其影响研究也时见新颖独到之处。港台学术多半具有西学背景,与西方联系密切,几可说是西方学术的组成部分;但港台学者极力倡导“阐发研究”(即西论中用)、建议营造中国学派以与法国、美国等学派分庭抗礼之举,则显示出更为积极的治学态度。近年来出现的“汉学热”、大陆与港台频繁的学术交流,传递了大量海外学术的信息,这无疑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

总之,这百年来的学术史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比较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基于共同的研究对象而建立了互动、互惠乃至互融的关系,而且前者的日益兴盛必将给后者带来无限的生机。



上述两种学术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联姻，归根结底，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联系使然。中国文学久荣不衰，卷帙浩繁，为追求真善美而写人生、写社会，具有劝善惩恶、怡情悦性的美质；其艺术手法也精巧、细腻，使得作品绚丽而多彩。而且它在发展过程中，或以恢宏气度接纳外来文学，或以独具的风姿播扬于国外。这样的文学一旦考察其外向关系，便会有无尽的趣闻与佳话；一旦进行中外比较，便会与他者相映成趣，相照生辉；一旦置于异种理论的观照之下，便会益发玲珑剔透，耐人寻味。而所有这一切，均是适宜比较文学发展的温床。

本书选文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下面按照选文的五种类型略加说明。

（一）影响研究关注历史。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始而与邻国交流，继而远播欧美，中外文学不断地交汇、碰撞乃至融合。诸如《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伏尔泰与《赵氏孤儿》、歌德与中国小说、托尔斯泰与孔子、庞德与中国诗歌等等，已属基本明确的史实；此外尚有大量未曾触及的史实有待进一步挖掘。这些姻缘关系为影响研究选择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学者们辨轨迹，探幽隐，揭示中外文学交流的实情和规律。外来影响既深且广者，莫过于印度文学；季羨林的《印度文学在中国》从先秦说到现代，从文体说到内容，从研究说到翻译，是一种概览性质的研究；而陈寅恪的《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则不止于从佛经所载观察《西游记》某些情节的由来，而且总结出了文本演变的三种形态。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见之于邻国（尤其是日本）文学，这是世界文学交流史上一种十分罕见的现象；小岛宪之就日本典籍《古事记》详述该书所依据的汉籍，以及如何在体例、意匠、内容、文句等方面取法于汉籍，透露出日本文化早期的模仿与追求；日本的《浦岛子传》被称作“汉文传奇”，属晚出文体，严绍璁以细腻笔触揭示这部作品在“受容”时融仙境、蓬山、玉房、灵龟于“艺术构思”，凸显传说、志怪、传奇等中国文学的“媒介作用”；通过这两篇文章，也许能约略看出中国文

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更长久、更深刻。中西文学的接触肇始较晚，由于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其影响方式也比较特殊。譬如说元杂剧《赵氏孤儿》，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给予高度重视，并且据以改编成《中国孤儿》来体现儒家的道德学说，但对于这出戏的文体特点和艺术手法，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赵氏孤儿〉在欧洲的传播》一文里，范存忠便分析了法国和英国学者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剧不符合新古典主义所崇奉的“三一律”，不能和欧洲戏剧相比；另一种意见却列举中剧与古希腊悲剧的相似或相近之处，借以肯定中剧的优点。分辨中外文学因独立发展而各自形成的模式，或者判断孰长孰短，孰优孰劣，并不是为了满足民族主义的虚荣心，而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两种文学的特点与性质以及两者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当我们说中国文学独具风姿，乃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时，自然要根据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方可作出这种判断。

（二）平行比较是针对中外文学进行证同辨异的研究，包括分辨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我国传统学术，因时空条件所限，除了采取本土化了的佛学观点外，一般是依据传统看传统，身在庐山之中，不云横岭侧峰。20世纪比较文学的探索，使得传统学术有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观照。进行平行比较不是基于“事实联系”，而是基于研究对象间的可比性。中日诗歌表面上看相似之处甚多，但细究起来，也会发现某些区别，铃木修次的文章即是重在辨异的一例。他认为，中国文人以经世从政为终生奋斗目标，其作品自然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日本文人倾心于脱离现实的文学，其作品里则流动着一种触目生愁的感伤情调（“物之哀”），这在世界文苑中也是很特殊的。中西比较，饶有趣味。朱光潜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就人伦、自然、哲学和宗教几个范畴，说明中西言情、写景、叙志、抒怀、游仙等作品的小同而大异，以凸显各自的特点。但这种剖解并非游刃于字句之间，而是深探中西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哲理基础，透露出艺术构思的深刻性。在关于汉代“乐府诗”的专题研究中，作者傅汉思（Hans H. Frankel）根据全世界的口述传统

来考察中诗，因此他时时援引欧洲诗歌或加以烘托，或提供佐证；于是，他得出中西民谣在很多方面（如简约叙事、复沓句型、变换人称、运用套语、衬字等等）极其相似的结论，而这又暗示出了民间创作手法的普遍性。从事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首先要判断西方的“novel”（长篇小说）一名是否可以用来称呼中国的虚构性长篇叙事作品，如《金瓶梅》、《红楼梦》。浦安迪（Andrew H. Plaks）的文章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他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解决方式，即从思想史角度观察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包括通俗性质、问题人物、写实手法和反讽策略——的形成；这些特征均涉及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据此便可看出了中西两种文体的近似与关联。饶芃子、曹文静的《论中西戏剧结构的差异及其成因》一文，如文题所示，旨在辨别两者的相异之处；论者虽然从常见的悲剧与喜剧问题入手，但笔锋触及哲学观、价值观、审美情趣、戏剧艺术产生的诸层次，给了老套话题以新颖而深刻的解释。俄苏的类型学研究则以视野阔大见长，这一点从李福清广涉亚欧各国作品的论文《中世纪文学发展的特点和类型》即可看出；这篇文章综观中世纪的文学体裁，说明其作用，分辨其等级，阐述其手法，归纳其特点，而且论及文类发生学和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全文自有中心论旨，分辨作品异同围绕论旨而展开，这是平行比较的另一种模式。

（三）中国古典文学在内容、形式和艺术上的丰富性，也使它在跨越学科界限而溯源探流、衬托比照时充当研究对象。诗与乐、诗与画的异同是传统话题，后来又见诗歌与其他艺术（如雕塑、电影）、中晚唐诗风与巴洛克风格等等的比较。^①不过，相对而言，这种研究比较罕见，仍处于有待开拓的阶段。朱维之和程抱一的文章，一鸟瞰，一细察。前者历数中国文学的种种宗教背景，试图指出其中来自宗教的所有影响，并且以实例说明作品里具体的宗教因素；后者基于现代符号学设想，深

① 例如，叶维廉：《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语言与美学的汇通》，见叶氏所编《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台北，1977）；麦克劳德（Russell McLeod）：《巴洛克作为中国文学的分期概念》（原载《淡江评论》第7卷第2期，1976）。

人挖掘中诗语言之形式因素的隐蔽蕴涵,尤其是它们与中国宇宙论的关系。小说和史著分属两种文体,公认其旨趣、技法有天壤之别,余国藩则从中国小说看到了两者的关联,把写实与虚构的分辨引向深层结构。这些研究反映出中国古典作品结构复杂,媒质多能和艺术精巧,因此也深化了读者的认识和理解。

(四)比较诗学以“诗学”(即文艺理论)为研究对象,是两国文学理论的比较,或者是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其他学科理论的比较。对外国作品有了一定的了解后,便会产生再去了解该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需要,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的比较诗学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主体,其中以西阐中或中西互阐最有价值。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里,钱钟书推阐“人化批评”及其优点,以大量事实证明西人“只注意到文章有体貌骨肉,不知道文章还有神韵气魄”、“只知道文如人有强弱之分,尚未悟到文如人有雅俗之别”,进而断定“西洋谈艺者稍有人化的趋向,只是没有推演精密,发达完备”。发明我国传统文论不仅可以自铸术语(如“人化批评”),也可以借用西方术语加以提领,刘若愚即是用“悖论诗学”来总括诸如“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王维《酬张少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诗思和诗论;“悖论”在此有似非而是之意,恰好指明了我国传统诗学巧妙追求简明性、暗示性和含蓄性的本质特点。中西诗学均见以“镜子”意象设喻的例子,乐黛云通过中西有关论述的比较,以小见大,既指出以镜取喻可镜人鉴古、亦可以镜照镜的多端,又指出中西镜像因文化根基不同而所获功能的差异。在西论盛行的今天,上述这些发掘中论幽趣与奥旨的研究便显得弥足珍贵。中西文论在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可能诱发“共同诗学”(common poetics)的思考,叶维廉回答了如何在跨文化背景下构建批评理论的问题。他一方面告诫读者不可忽视东西方的文化模式,一方面提出可行的方案预示中西诗学交融的前景。在此,比较诗学已经步入了方法论的领域。

(五)对于我国学者来说,西论中用也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理

论乃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其实质也就是通过西论移植而建立起来的中西两种文学的比较;因此在操作过程中,西论受阻,则暗示两种文学有所不同;西论畅行,则说明两种文学有所近似。其实文学创作的宗旨、技巧,文学作品的结构、意趣,文学发展的动因、辙迹等等,无拘中外,或多或少皆有相似之处,正如郑振铎所说:“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插图本文学史》)这一事实为移植理论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王国维是移用西论的先驱,其《红楼梦评论》虽在立论上有得有失,但借西方美学理论和悲剧理论以作深入剖析的尝试,一扫顿悟式、索隐式评论的积习;这篇文章遂被视为我国现代学术、比较文学之肇端,其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西论介入之际,即是新透视形成之时。“杨林”故事经结构主义的图解,便归纳出感悟人生基本经验的模式;《花间集》经女性主义的权衡,词中女性形象、词有别于诗的特质便形成了新的蕴涵;中国叙事作品经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译“互文性”)和话语理论的透视,便有了衍生文本的规则。西论中用视角新颖、运思灵活,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纳入比较文学视野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开放型的研究,即向着别国文学、外来思潮、他种艺术和学科开放。这正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迈向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三

诚然,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互动已经展示出了广阔而美好的前景,但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一些新的矛盾又浮现了出来,比较文学面临着新的挑战。譬如说,它业已定型的研究有无继武的必要、它的哪些研究亟待开拓、哪些研究亟待深化等等问题,又需要作出回答。温故而知新,本书所选的文章,不管是较早问世的还是晚近发表的,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影响研究即是业已定型且成果累累的一个研究分支。有人认为,比较文学应当重点关注理论问题,而探查轨迹、辨明史实的做法已经过

时。这种观点其实缺乏依据。古人云“史不绝书”。自古而今中外文学交流未曾须臾中止,及至交往频繁、传媒发达的今天更是愈演愈烈,愈演愈奇,而且依然有我国古典文学参与其间。因此中外姻缘关系仍在不断建立,而且日趋复杂,如《论语》在西方的新解说、虚实观与解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我国、中国典籍借艺术创作而非翻译得以西播的途径等等,均属有待深入稽考以弄清真相、辨明规律的史实。即使是年深岁久的姻缘关系,如选文所示,亦须辨之于细微,否则事实不会清晰;亦须归之于史论,否则考察便会流于肤浅。一种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均须基于确凿史料的深度研究加以辨识,因此,关于中外文学交流史的考察离不开史学理论的引导。另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主张让中国文学更多地走出国门的呼声也益加响亮,其目的无非是面向世界来弘扬中华文明。鲁迅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摩罗诗力说》)影响研究即提供了大量的“审己”、“知人”的史学知识,有鉴于此,当能增强我们内引外扬工作的针对性和预见性。

平行研究虽已定型,但对其实例有时褒贬不一。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可比性”。从本体论角度判断“可比性”的基本性质与规律,是认识它的一种途径,而由于它在实践中的表现千差万别,反思一下典型个案的做法则是另一种途径。所谓“可比”,无非是指研究对象间具有相互比较的前提或基础,不过,这种前提或基础并不是仅具单一形态的固定模式,而是随着研究宗旨、研究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铃木修次比较的是貌同而质异的事物,其前提是并非成立的预想:日本诗歌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两者当有相同或近似的性质;浦安迪则比较貌异而质同的事物,其前提也是一种并非成立的预想:中西小说相去甚远,在本质上不可能有相同之处。两种研究一属反衬,一属类比,虚假的前提使它们带上了驳论的性质,而研究对象同属一种文类的事实,才是它们赖以进行的基础。朱光潜关于诗歌情趣的比较,是将对象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尽管关于中诗的论述较多),两者构成平等关系;钱钟书主要讲中国“人

化批评”的细腻和微妙，西论只是作为衬托，两者则构成了偏正关系。对象的身份或地位不同，并不妨碍它们参与比较。傅汉思为说明乐府诗的特点而间或援引西方诗歌，使得比较对象的结缘带有某种随意性；而李福清以“中世纪文学”之名网罗东西方作品，且不管它们相同与否，均置于比较权衡的目光之下，则使对象的结缘多少带有强制性。这是比较方式给“可比性”带来的变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其复杂多变的表现形态恰恰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比较”作为研究手段的工具性。这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是决定性因素，比较只能为明此宗旨、达此目的而服务，当用则用之，当变则变之。如果为比较而比较，便成了本末倒置。平行研究的重心在作品的文学性，因此多半就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文体风格、结构因素等等加以比较；有时则考虑文学作品的外在条件，就文学时期、运动、风尚等等加以比较。

近20年来，我国译介西论成就非凡，学者们既关注前所未译的古代西论，更积极追踪西方20世纪的新思潮、新理论。译介的繁盛大大开阔了我国的理论视野，以至出现了所谓的“方法论热”。这种情势起码给比较文学又提出了两个课题：一是如何利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即“西论中用”；一是如何使西方文论与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起来，即“比较诗学”。

在整个20世纪，自王国维以降，西论中用一直在推动着我国学术的发展。由于中西文学或同或异，西论中用遂有可行的一面，也有不可行的一面。可行时，中国古典文学便会展露新姿态、新意蕴；不可行时，便迫使西论非要根据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定对象加以修改或者补充不可。可见，西论中用的尝试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有助于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研究，因为它不止于提供有别于我国传统学术的视角与方法，更进而以其丰富的实践为建立总体性方法论打下基础。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曾经鼓励这种尝试：“批评家不应该仅仅试图构建一种方法，而应该构建一种方法论——而且应该时时想到批评遗产的‘共同启示’以构建这种方法论。”（《关于文学形式的哲学》）二是为检验西